

全球化与文学:视角、立场与方法

何成洲

内容提要:随着当代全球意识的崛起,一些普遍出现的问题和现象成为不同民族文学共同关注和反思的对象。这些反映不同主题和思潮的文学在全球流通过程中得到彰显,并在不同文化语境下产生本土化的流变。这种世界文学的新形态,改变了跨文化交流的路径和方式,既反映世界历史进程,同时也对于世界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在讨论全球化历史进程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时强调以下几点:文学作品反映全球化的场景、进程和问题;文学作品能够生产和修正全球化的话语叙事;文学研究有助于理解和阐释全球化,同时全球化的理论和概念也为文本分析提供新的视角;文学的生产和传播过程越来越受到全球化的影响。

关键词:全球化 当代文学 文化身份 世界文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各国文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与此同时,全球化带来若干问题,不仅受到本土化的抵制,甚至引发“反全球化”的浪潮。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错综复杂,随着全球意识的崛起,一些普遍出现的问题和现象成为不同民族文学共同关注和反思的对象,其中主要包括:生态与环境危机、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少数族裔的身份和权力、女性主义等。这些反映不同主题和思潮的文学在全球流通过程中得到彰显,并在不同文化语境下产生本土化的流变,一些普世的命题被批判性接受和反思。这种世界文学的新形态,改变了跨文化交流的路径和方式,既反映世界历史进程,同时也对于世界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需要理解和解释一些比较宏观一点的问题,比如:全球化概念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对于文化政治和文学创作产生什么样的

影响?文化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文化产品,包括文学作品,在生产 and 流通过程中对全球资本和市场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西方的理论概念,比如性别、族裔、流散、生态、后殖民等如何传播并本土化,是强化了还是削弱了文化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我们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下批评反思诸如主体性、他者性、世界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当代文学呈现了什么样的全球化主题?文学研究的跨国民族主义转向与传统的民族文学研究范式是什么关系?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从视角、立场和方法等不同角度来思考全球化与文学和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首先,有必要梳理一下全球化的概念以及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

一、全球化的文化纬度

如何理解全球化?这方面争议颇大。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首先是指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其次,它指针对全球化话题而不断涌现的跨学科知识体系;再有,它是指有关的话语、叙事和图像。(Connel and Marsh xiv-xvi)虽然全球联系和全球视野早就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但“全球化”这个术语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使用,直至80年代后开始流行。约翰·汤姆林森说:“可以确信的是全球化,虽然是个使人恼火的术语,却抓住了一个有着重大意义的过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界定了我们时代的文化状况。”(Tomlinson 148—149)

当代世界的全球化具有一些显著的特点,需要加以理解。首先,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推动全球化、全球意识和全球联系的历史进程是一些结构性的力量,比如数字技术、市场化等。虽然去全球化或者抵制全球化很困难,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全球化的类型,进而影响全球化的形态,比如:以市场为主导还是以官方为主导,以欧洲为中心还是多元文化的全球化,等等。其次,全球化不只是推动同一性,而且也催生差异性和多样性。全球化在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的发展程度不一样,对不同社会中不同人群的影响程度不一样。全球化没有终止文化的多样化。当文化相遇时,产生了众多新的

球事务：文学研究的跨国民族主义转向》一书中探讨了英文书写将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混杂性。“这一过程的确在英语的全球生产中发挥了作用，越来越多地受到南亚及拉丁美洲书写（一种形成于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拉丁传统）、美国黑人文学以及美国流散社区（亚洲人、波多黎各人、多米尼加人、南亚人、非洲人等）特有文化传统的影响。我们所谓的‘英语’文化完全是一种混合物，它建基于不同文化传统之间错综复杂的交流之上，从而越来越难以找到一种不受来自英美之外的资源和话语快速融合的控制和影响的主流西方话语。”（Jay, *Global Matters* 66）这解释了为什么时下人们会用复数的英语（global Englishes）来描述英语和英语文学在全球的状况。

全球化对于世界文学的挑战还体现在西方的文学研究理论被普适化这一问题上。文学研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被同一化，这与西方批评理论、术语及实践被广泛运用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同地区和文化的文学研究都被西方批评话语所笼罩。英语在文学研究中的统治地位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加强。“卡普兰以女性主义对本土的重视反驳了这一欧洲中心主义倾向，旨在颠覆全球化理论家所谓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权力关系。（她与斯蒂格利茨之间的一致性是惊人的，后者强调在经济事务中将主权归还给地方和国家，使之从全球化中获益。）对卡普兰来说，阿德里安娜·里奇和钱德拉·莫汉蒂等批评家所说的‘地方优先’要求我们将地方文化视为抵制全球化的场所，并强调在西方学术消费中，全球化的文学研究通过自身规范化词汇的疏导，使世界文学避免被殖民的危险。”（Jay, *Global Matters* 68）中国的文学研究现状也不容乐观，不仅外国文学研究在消费西方的学术理论，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也基本如此。理论概念常常决定我们的思考方式和认识模式，完全西化的文学研究体系对于我们的创新思考和民族文学的传承产生复杂的影响。

对于全球化历史进程与文学进程的关系，本文强调了以下几点：文学作品反映全球化的场景、进程和问题；文学作品能够生产和修正全球化的话语叙事；文学研究有助于阐释全球化的理论和概念，同时全球化的理论和概念也为文本分析提供新的视角；文学的生产和传播过程越来越受到全球化的影

引用文献

- Bernal, Martin.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 I.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
- Edwards, Brent Hayes. *The Practice of Diaspora: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the Rise of Black International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Fisher, Dexter, and Robert B. Stepto. *Afro-American Literature: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struction*.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1979.
- Gates, Henry Louis, and Abby Wolf, eds. *The Henry Louis Gates, Jr. Reader*. New York: Basic Civitas, 2012.
- Gilroy, Paul.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Leitch, Vincent B.,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 Morrison, Toni. *Playing in the Dark: 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 "Unspeakable Things Unspoken: The Afro-American Presenc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the Color Line*. Ed. Henry B. Wonha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6. 16-29.
- Turner, Darwin T., and Barbara Dodds Stanford.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Teaching of Literature by Afro-Americans*. Urbana: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 1971.
- Walker, Alice. "Looking for Zora." *Between Women: Biographers, Novelists,*

或被殖民者,或对两者,即他所说的“殖民主体”(colonial subjects),而不是对物质层面上政治的和社会的现象所做的思索上。与赛义德不同,巴巴重视殖民权力和话语中的矛盾和冲突,并且认为这些矛盾和冲突最终将导致殖民或新殖民权威的颠覆。他在《差异、区分和殖民主义话语》(1982)中首次讨论了赛义德的观点。在该文中,他认为赛义德关于殖民权力是大一统的和统一的这一观点与福柯并未明确表述的异质性话语观是相矛盾的。然后,他用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之中创造的一个“新的居中的范畴”(new median category)来作为他对殖民权威和话语的本质、殖民主义的刻板形象以及殖民主体的心理进行理论化阐述的出发点。(Bhabha 73)他专门挑出东方主义话语中的矛盾来讨论。在他看来,对于赛义德来说,东方主义是受到“历史和叙事的历时形式和不稳定标志”威胁的“共时本质主义”的“一个静态系统”。东方主义既是一个官方的政策,也是一系列的幻想和形象等东西。最后,东方主义既是“一种无意识的肯定性(隐蔽的东方主义),也是一系列陈述出来的、有关东方的、被赛义德称作明显的东方主义的知识 and 观点”(Bhabha 71)。巴巴强调在赛义德的著作中,这些对立被转变成“政治一意识形态的意图,这一意图,用他的话来说,能使欧洲在东方的基础上牢固地和非比喻意义上前进”(Bhabha 71)。巴巴看重东方主义话语的对立和矛盾状态。他提出的“中间”者(the “in-between”)这一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来自于《东方主义》中一个“未得到充分阐述的段落”,在那个段落中,赛义德将东方描写成在西方对熟悉的东西的蔑视和西方对新奇的东西的高兴或害怕的颤抖之间摇摆。赛义德将这一摇摆的情况称作“新的居中的范畴”,这一范畴使人们“将新事物,即第一次被理解的事物理解为一个先前已知的事物的变化形式”。巴巴发问:“围绕‘居中的范畴’,殖民话语的这种其他的情景扮演何种角色?”(71—73)他对弗洛伊德的“恋物癖”这一概念进行了部分的改动,并将这一改动的概念用于解读殖民话语中的刻板形象。在其他的一些论文中,他通过混杂性、矛盾状态、模拟、中间者和“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等一系列概念来阐述类似的观点。所有这些概念清楚地表述了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以及在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和地位低下的、受支配的阶级之

四、结语

赛义德在后殖民研究领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东方主义》存在着理论、方法论等方面的问题,但这并不影响其价值,因为它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不仅打破了学科的界限,而且将话语理论与真实的社会斗争、政治斗争联系起来,探讨了文学、文化、历史和政治等多方面的问题。(塞尔登等 268)巴巴和斯皮瓦克等理论家发展了后殖民理论,他们的研究既是对赛义德的著作的补充,也是对其著作的挑战和修正。正如批评家阿里夫·德里克在其《关于后殖民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所说,“起始于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的那种后殖民主义谱系,后来通过佳亚特理·斯皮瓦克(有时也包括斯图亚特·霍尔及文化研究)的著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到霍米·巴巴那里达到了极致”(德里克 21)。此后,许多理论家和批评家延续并扩展了赛义德在《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和其他著述中对殖民话语的分析以及对再现“他者”、“位置性”等后殖民研究领域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

种对峙和反叛。更多的日本女性已经彻底从传统的生活伦理中解放了出来,更加自信地向日本男权社会发起了挑战,自由地选择属于个人的新生活,宣扬个体的感受性。因此,家庭、伦理道德也就自然成为越来越多活跃在日本现代文坛的女性作家们所关注的焦点。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坛可谓群星璀璨,杰出的女性作家有大庭美奈子、平岩弓枝、三枝和子、村田喜代子、林京子、富冈多惠子、小川洋子,等等。特别是那些战后出生的“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像高树信子、津岛佑子、金井美惠子、中泽惠、林真理子、山田咏美、松浦理英子、荻野安娜、吉本芭娜娜等更是成绩斐然。

处于新时代的女性作家们绝大多数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爱读美国小说,喜看好莱坞大片,好听美国流行音乐,接受了西方近代文艺思潮和文艺理念,在审美创造上尝试着以一种开放式的、多元化的文学理念诉说自己的时代,大胆地表述自己的故事和个人意志,将女性的话语言说提升到了意识形态领域,浓墨重彩地构建了女性话语的空间,从而打破了传统日本文学的语言体系,解构了男性主义或男权思想的话语体系。她们用独特的文体和叙事方式将单亲家庭、女同性恋、未婚妈妈、异域婚恋、女性犯罪、男性缺场等反映社会时代的题材纳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由此可以见出她们的创作审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女性作家们对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贤妻良母”、“相夫教子”、“贤德忍让”的家庭观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剖析和反思。这种剖析和反思一方面客观上繁荣了日本现代女性文学,另一方面也对在新世纪反对乃至消除封建残余思想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和积极作用。

下面本文就以日本现代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主要从对制度内女性分工的反叛、对家庭观念的颠覆与重建、对传统伦理的否定与摒弃这三个方面探讨现代女性作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是如何描述并折射出笔下女性人物的家庭、伦理道德的。

一、对制度内女性分工的反叛

所谓制度内的女性分工就是指日本父权或男权社会“男主外,女主内”

川端康成说：“这种小说，在世界的每个地方都能见到，然而如此表现形式的小说，在日本还不多见。”（“当选作品评委专栏”128）

《山中女妖的微笑》中的女妖从小就具备了读懂别人内心活动的能力。做姑娘时，她就知道母亲对自己有什么要求，不等母亲说出来就会照其心意行事，婚后与丈夫的关系更是如此。她能完全洞察丈夫内心的需求与想法，以不伤其自尊心的形式将这种想法付诸实施。然而就是这样看似温顺、柔弱的女性也最终以强者的姿态，将所有与自己处于相对关系的人玩弄于股掌之中。临死前她面露微笑，仿佛已看透丈夫和孩子的心思，在向他们宣布自己彻底解放的喜讯。可以说大庭美奈子笔下的女性具有强烈的制度内女性分工的反叛意识，也正如2007年5月24日《读卖新闻》在大庭去世的当天所发表的评论那样，“她小说中的主人公多为女性，她们不安于做主妇、做母亲的角色，带有强烈的自我不满足感和空虚感”。

如果说大庭美奈子拉开了反制度内女性分工文学主题的序幕，那么随之而来描写不安于社会制度长期强加给女性一些传统美德标签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如津岛佑子通过《阳光照射下的空间》（1979）、《奔跑在山中的女人》（1980）竭力摆脱婚姻制度对女性的束缚，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生育权；笙野赖子在《大祭》（1981）中以半自传的形式表现主人公努力逃脱现实生活中长辈的严格管教；富冈多惠子则是通过小说《起伏的山地》（1983）、《水上庭园》（1991）描写女性对日本传统女性行为规范的决裂；山田咏美的《做爱时的眼神》（1985），增田瑞子的《单细胞》（1986），仓桥由美子的《交欢》（1988—1989），中泽惠的《感受大海的时候》（1989），小川洋子的《妊娠日记》（1991），多和田叶子的《狗女婿》（1992），高树信子的《我那拥抱光明的朋友》（1989）、《水脉》（1994），三枝和子的《响子》系列《响子爱染》（1991）、《响子恶趣》（1993）、《响子不生》（1994），留美里的《家庭电影》（1996）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多元化地展示了现代都市女性对传统婚姻、家庭的动摇，表达了现代人所拥有的家庭观。她们在思想上、行动上拒绝做一个贤妻良母，不断追求自我独立的生活，厌恶墨守成规、毫无新鲜感的生活方式。新时代的日本女性对传统的这些反叛又必然集中表现在她们对家庭观念、传统伦理

的价值观和生活准则,有自由选择、自主决定自己行为的权利,不听命于或服从于男性,不唯唯诺诺,敢于抗争社会强加于自己的不公,不为命运所屈服,是生活的强者。

可以说在津岛佑子的小说创作中,“父亲”往往是缺失的,或死亡,或离异。“父亲”在家庭中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而“母亲”则是家庭的依托,从而否定了日本社会长期以来以父权、男权为中心的传统家庭观,重塑了“母亲”独立自主、坚强不息的新形象,构建了以“母亲”为主体的新型家庭模式。在这种新型家庭模式中,“单身母亲”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是完全依靠个人的坚强意志和独立的生活意识来完成养育孩子的任务。

3. 无血缘家庭

家庭成员的离家出走、单亲家庭的出现、亲情的缺失等等必然导致血缘关系的完整家庭走向解体。不以婚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重组家庭在日本女性作家的笔下便成了一个圆满的家庭。

1995年当韩裔日籍女作家柳美里在《文学界》5月号上发表新作《客满新居》之后,旋即获得当年度上半年第113届“芥川奖”候补奖提名,1996年又连续获得第24届“泉镜花文学奖”和第18届“野间文艺新人奖”。小说描写的是一个“虚拟家庭”的故事。作为一家之长的父亲,花了一笔巨额资金建起了一座二层楼的新居。房间里添置了很多新买的生活用品,就是为了使原本有婚姻、血缘关系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能回来一起生活。然而,与人私奔的妻子和两个已经长大成人、独立生活的女儿并没有接纳这位“家长”的好意。她们拒绝与“家长”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于是,这位“家长”为了维系“家族”和“家庭”的温情,硬是从车站“拣来”了一家四口无家可归的人,并让他们同自己一起居住在新居里,由此组成了一个“虚拟家庭”。

接着,2000年与2001年柳美里又分别创作出了新的“虚拟家庭”小说《命》和《魂》。这次的“虚拟家庭”不是以男性希望家庭重组获得温暖为题材。它更像是作者本人的“自传体”的“私小说”。在小说《命》中,作者自述从怀孕到未婚妈妈的艰难历程。小说《魂》可以视为《命》的续篇。人物、事件、情节一脉相承。未婚妈妈柳美里、母亲梁荣姬、未婚妈妈同有妇之夫的日

日常加以异化,本身就冲破了传统的社会伦理价值观。

总之,随着时代变化、社会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日本的社会文化以及日本人的文化价值观受到了审视。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女性的独立自主权都比以往更加受到了重视。家庭、伦理成为越来越多活跃在日本现当代文坛的女性作家所关注的焦点。她们以一种开放式的、多元化的文学理念诉说自己的时代,大胆地表述自己的身体和个人意志,将女性的话语言说提升到了意识形态领域,浓墨重彩地构建了女性话语的空间,从而打破了传统日本文学的语言体系,解构了男性主义或男权思想的话语体系。

周萍萍:《承传与摒弃:论日本女性文学中的道德观衍变》,《外国语文》2012年第4期。

竹田青嗣:《山田咏美论——至近的眼睛》,《新锐作家论特辑》,东京:河出书房新社,1986年。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Marvelous in Canadian Fiction”)中谈道:“加拿大小说,作为对一个自成体系文化的表达方式,是名副其实的。小说的神奇性可能会回答我们长期以来对自己身份的困惑,帮助我们更准确地为自身定位。小说高度强调了淹没于理性之下的品质,帮助我们揭示新的历史真实。魔幻现实主义能够把加拿大的现实和幻想融合在一起。”(44)扎根于悠久的加拿大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与北美魔幻现实主义传统相糅合,成为一种能够很好地表达同主流思维方式相悖之观点的叙述手段,在创作手法上采用“混杂”、“模拟”等“非对抗性”写作策略,为独立民族文化观念的表达留出余地。

加拿大后工业社会“后殖民与民族性”的文化逻辑之争扩散到加拿大文学内部的殖民中心对被殖民者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加拿大作家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民族文化特色逐步形成、展演,并穿透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拆毁帝国中心话语,成为一种抗争意识的表达。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当我们再次讨论加拿大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对文学的影响时,已有可能摆脱上个世纪40年代人们那种孤独、隔离式赞成/反对式的简单化的话语模式,而进入一种更深层的探讨。真正有成就的加拿大作家像伦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蒂莫西·芬德利(Timothy Findley)、鲁迪·威伯(Rudy Wiebe)都不是单纯模仿英美作家的写作技巧和风格,而是借鉴英美文学的传统作品,将后现代小说的很多技巧呈现在后殖民的作品中。《大大方方的失败者》(*Beautiful Losers*, 1966)是70年代和80年代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先声。小说植根于加拿大60年代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之中,人物故事化作碎片散落在语无伦次的叙述中,从民族和性别的角度突出表现了反对权威的、中心的意识。在《大熊的诱惑》(*The Temptation of Big Bear*, 1973)中,威伯毫不隐晦地采取虚构手法,淡化了历史文本与小说文本传统的界限,提供各种不同的历史视角。威伯把英国人书面记载的空洞、枯燥的内容,与“大熊”口语中意韵深长的表现力对立起来,瓦解以强势权力话语为特征的历史统一性。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手法和写作策略没有将后殖民文学带到民族主义的对抗中,而是持非本质主义的态度,强调混杂的现状,寓反抗于挪用之中,颠覆英国殖民主义宗主国的政治和文化霸权,解构英国殖民主义的殖民版图,描摹出新的加拿大民族文学蓝本。

覆和崭新解释。他向读者展示了被排斥在城市边缘的多伦多移民建筑工人的历史,把焦点集中在城市中艰苦又危险的几个角落,讲述黑暗边缘那些没有盎格鲁-凯尔特或法兰西血统的移民的生活故事。小说表现了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特色,将被阶级和性别概念排挤在历史以外的外来者和边缘人物推到了中心位置,强调事件的偶发性,消解和颠覆了官方的“正史”。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作家摆脱了地理划分的地域限制,他们的艺术视野开始投向城市生活中人的孤独和异化。孤独、异化的内心感受与作家的文风在精神上相互照应。加拿大地域文学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发生了从外在化到内在化的主题嬗变。其中最能回应时代问题的一种便是“神秘的地域主义”观照下的人生世态。神秘地域主义理论把地域的形成归于作家的思维创作,忽略了现实的决定意义,作家不急于追求近距离的及时反映与真切把握,将事实和原因安于一种含糊的、不确定的、神秘的境界中,因此使地域的概念变得模糊而不可捉摸。在后现代话语语境中,加拿大正在分裂为许多意义不同的区域,地域既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理概念,同时又脱离了它本来的意义而上升到一个更高层次。神秘地域主义打乱了人们对地域认知的因果关系,从人类想象活动的结果而不是现实的地方或地域出发,把地域的切实存在解释为人脑的抽象元素,成了人物心灵世界的艺术外化。文学文本对个人内心世界的关照导致了影像和影像所指喻的现实之间的滑落、现实主义小说的程式与后现代主义元小说的自我观照之间的对抗,以及虚构的地名和地理空间形式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女性作家的写作在探索(和否定)新的地理范围和界线时起到了引领作用。”(Hutcheon 78)阿特伍德的《浮现》(*Surfacing*, 1972)以没有姓名的叙述者讲述女主人公“我”回魁北克省的故乡寻找失踪的父亲为线索。阿特伍德对虚构的、模糊的充满文学色彩和象征意义的岛上风光的涉足,就是一位艺术家在异化的工业文明中自我找寻的远航。

后现代语境下的边缘化使得地域主义在加拿大摆脱了局部意义,加拿大文学从自然书写、边缘化的欢庆到神秘主义一直在寻求恰当的表现形式表达地域文化所表现的内容。地域文学所凸显的文化属性和民族、时代特征在新

雾里看花花更花

——谈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文类混用

胡全生

内容提要: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在创作中喜好文类混用,如品钦、莫里森、阿克,他们把一部小说做成了“既……又……(还……)”的模样。本文就文类混用这一“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点”,从三方面作了探讨:1)为什么文类能够混用;2)文类混用的类型;3)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何以喜好文类混用。本文认为,文类混用做成的小说就像那雾中的花,模糊着,却更加艳丽,因为它更加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如果读者阅读小说是个实现期待的过程,如果期待因文类而生,那么不同文类混合就意味着多元的文类带来了多元的期待,读者也就愈加兴趣盎然,而这大概就是后现代主义“什么都行”的政治效应。

关键词:文类 文类混用 后现代主义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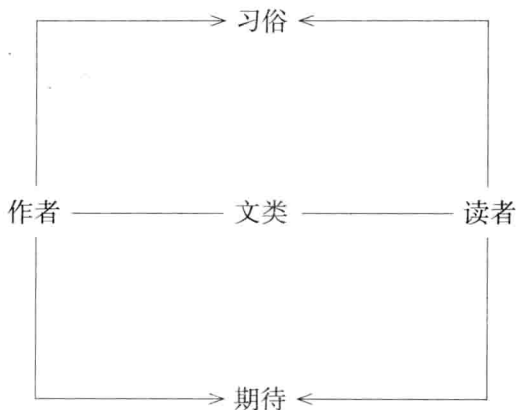
谁能说得清品钦(Thomas Pynchon)的《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 1973)是部什么样的小说,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宠儿》(*Beloved*, 1987)是部什么样的小说,阿克(Kathy Acker)的《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 1983)是部什么样的小说?即是说,它们属于哪一文类?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三位评论家是怎么说的。

三年前,辛丁(Michael Sinding)撰文讨论《万有引力之虹》的文类问题,首先提到评论家对此小说的文类有多种说法,而他只“想谈谈《万有引力之虹》的三种有影响的文类划分”,一是布克(M. Keith Booker)视它为“小说”,二是门德尔松(Edward Mendelson)将它命名为“百科全书式叙事”(encyclopedic narrative),三是卡珀天(Theodore Khapertian)视它为“梅尼普斯式讽刺”(Menippean satire)^①。三者中,“最明显的类别是将它归属于‘小

^① 以古希腊犬儒主义哲学家梅尼普斯建立的模式为基础的讽刺。这类讽刺作品采用散文体,常穿插一些诗文,形式混杂,常由结构松散的叙述构成(见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第555页)。

真正的、如奥尔德斯·赫胥黎说的‘思想小说’,而是‘语言小说’,在这样的语言里,话语种类,尤其是行话,碰撞着进入对话和竞赛”(Johnston 265)。约翰斯顿认为德里罗用文类混用做成的小说“图解”了巴赫金的“杂语变异”。

五、文类混用带来独特的叙事功能。文类与作者和读者,与习俗和期待,关系非常密切。这一点,笔者曾在《文类、读者与后现代小说》一文中作过讨论。前面已经提到,尼尔认为文类涉及三个层面,即期待层面、文类库层面,和支配这两个层面的“规则”或“准则”层面。笔者依据尼尔这一理论以及文类与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提出它们的关系可图示如下(胡全生,《文类》302):



图中,我们看到习俗层面“高高在上”,“支配其他两个层面”,因此“最为重要”。然而,文类习俗“不是法律”,所以作家创作时就可以抛弃某些习俗而增加一些新的东西,使这一文类发生一些变化,甚至产生出该文类的亚文类,即推陈出新,如由侦探小说到“反侦探小说”或“玄学侦探小说”,由言情小说到“新言情小说”,由历史小说到“后现代历史小说”。

由于“文类建立在习俗的基础之上”(Puschmann-Nalenz 30),而文类习俗又“在不断地进化”(Crew 77),所以,当习俗发生变化时,文类也就发生了变化,那么读者的期待就必定也有变化。一方面,由于作者抛弃了一些旧的文类习俗,增加了一些新的东西,使作品的文类发生了变化,作者所期待于读者的,也就有了变化,比如作者若是写了部玄学侦探小说(如艾柯的《玫瑰

之名》，或奥斯特的《纽约三部曲》），就不希望读者将它读成传统的侦探小说了。另一方面，由于文类发生了变化，读者的期待也必定有所调整，因为他或她若是抱着对传统的侦探小说的期待来读，多半是读不成的。比如，读者若是期待“穷凶”后的释然，他或她是期待不成的，因为在反侦探小说或玄学侦探小说那里，释然已经不重要了；它或许根本就没有。这种情景，麦克布赖德在解读阿克的《远大前程》时有过描述，说：“阿克大肆混用文类，这使得读者不能舒舒服服地将《远大前程》置于预先确定的类别，读者因而被迫面对数种选择，其中之一便是要重新界定已存的文类。……阿克[对自己作品]的界定是建立在读者的作为之上，而不是作者的作为（即作品形式或内容）之上。”（McBride 346）凯奴莱南解读《枣红马》时，也有过类似的评论：“将作品放入某一文类，读者就可以预测某些期待的满足。但是后现代小说，尤其是约翰·霍克斯的小说，颠覆了传统的文类划分并挫败读者的期待。”（Kainulainen 289）期待被挫败，或说期待不成，读者就会调整自己的期待，而且文类的改变也迫使读者调整，抱着新的期待来读这作品。而期待在，读者的兴趣就在，作品也就吸引住了读者。此可谓文类混用带来的独特叙事功能。

美国著名批评家玛乔瑞·帕洛夫（Marjorie Perloff）就后现代小说中的文类混用现象曾说过这样的话：“后现代文类的特征是挪用其他文类，既有阳春白雪的，又有下里巴人的，办法是渴望既有又有而不是非此即彼。”（8）她明确地指出后现代文类是个“悖论”：“越是淡化文类界线，文类这一概念性就越重要。”（4）纽宁认为帕洛夫这一见解“正确”，并赞同地说：“文类界线跨越得越多，习惯性的类别就越不稳定，确立某作品所采用、转换和颠覆的文类习俗就越重要。”（Nünning 233）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应该说没有人说得清它们是什么样的小说。然而正因为如此，读者读这样的小说时就有自己的选择，有积极参与的更大空间。一部小说读起来既像部浪漫史诗又像则寓言还像部哥特式小说（如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既像部鬼怪小说又像部历史小说还像部黑奴叙事

因,找出人类的文明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王诺9)。另外,对于祖先的崇拜、对家神的祭祀在俄罗斯多神教神话中具有较重要的意义和地位,这类神话与古俄罗斯人对彼岸世界及死亡的认识不无关联。一方面,在多神教信仰中,逝去的祖先到达彼岸世界后便“进入了统治自然力和人的命运的万能神祇的宫殿”(Забияко 46),因此子孙如违背先祖遗训将受到神祇的责罚;另一方面,逝去祖先的灵魂会变成家神保佑亲人,所以当人们搬家时,要邀请家神跟随主人一起乔迁,同时还要与木屋、家什告别。《告别马焦拉》中的老太太达丽娅在马焦拉岛被淹之前三次来到祖先坟墓前请求宽恕;人们在搬迁前像庆贺盛大节日般地打扫房屋,达丽娅像对待最亲爱的死者那样为难以割舍的家业举行祭奠仪式,为它哭泣,整夜地与其作祈祷式的告别,因为在她们的世界观里,“真理活在记忆中。谁失去了记忆,谁也就失去了生命”(拉斯普京 411)。正如达丽娅针对孙子安德烈征服自然时的狂妄自负所说的:“人变骄傲了,啊,变骄傲啦。你骄傲吗?你就要倒霉了。那骑着树杈砍树杈满不在乎的人,别自以为了不起呀。”(拉斯普京 334)由此,我们不仅看到了小说中的家族、亲缘意识,也深深体会到了作家隐含在民族神话背后的一种生态关怀,即“人对自然的责任”之价值取向。劳伦斯·布伊尔在其被称为“生态批评里程碑”的著作《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书写和美国文化的构成》中指出,“环境取向的作品”所具有的特征之一是“人类对这种环境的责任是文本的主要伦理取向之一”(Buell 7)。显然,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正体现了这样一种审视工业文明、保护生态自然的美学选择。

同是俄罗斯“农村散文”作家的阿斯塔菲耶夫对“人与自然”的书写同样离不开民族神话的烘托,只是他的“神话”更透着些许哲学色彩。小说《鱼王》塑造了一个品格高尚,对自然心存敬畏的游子形象,并通过他重游故乡时所思所感将“生命之河”和“生命之树”两个具有神话色彩的形象描述为:“它们是一切存在机制,一切开端与结局,一切地上、天上和地下的,亦即整个‘宇宙志’的直观体现。”显然,阿斯塔菲耶夫对于自然界神话的理解与索洛维约夫的宗教哲学思想的核心——“万物统一论”有很大关联,万物于统一之中构成一个和谐、有机的整体,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当然也应该是和谐统一